

7-1-24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ZHONG GUO BI JIAO WEN XUE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ISSN1006-6101

中國比較文學

第1期
2006年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深圳大学

二零零六年第一期
(总第六十二期)



中國比較文學

主 办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深圳大学

主 编 谢天振
出 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编 辑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
地 址 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
邮政编码 200083
国内总发行 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09006

ISSN 1006-6101



ISSN1006-6101

CN31-1694/I

国内代号 4-560

翻译的政治谱系与翻译研究新视角

——评费小平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刘 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6)01-0158-08

费小平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3月)是国内第一部明确标榜“翻译的政治”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涉及对古今中外“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的细致梳理与剖析, 上迄公元前古罗马时期的翻译理论, 下至20世纪后期的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翻译理论, 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其间译论林立, 资料浩繁, 作者以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 在庞杂的材料中细心爬梳, 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涉“翻译的政治”历史的、发展的画面。全书立论公允、材料丰富, 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等新视角, 对翻译所导致的不同文化碰撞与文化对话中隐现或显现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系统清理, 是在文化研究层面上开展的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这种新型关系被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主要表现在国际译学界一批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纷纷跳出原先仅关注于语言文本的狭小圈子, 将目光投向文本背后负载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聚焦特定文化制约下的翻译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第9页)

正是在这样一个对翻译研究的深刻见解之上, 费小平开始了他的“检讨”之旅。首先是在比较文学视野里, 传统的“翻译”身份受到质

疑: 从1931年梵·第根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对“翻译”的解读开始, 到20世纪90年代, 英国著名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学者、翻译研究专家苏珊·巴斯奈特提出重新定义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为止, 翻译研究已超越了对译本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 而上升为描述性的、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翻译研究已不再停留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简单转换的语言技术层面, 而步入解构的世界: 妮南贾娜将翻译定义为“增补”, 或德里达所谓的添补, 而德氏的“添补”, 则建基于对“一个中心或本源”观念的颠覆,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原文中心论”的无情拆解, 更是对纯粹对等翻译观的重估; 斯坦纳的“诠释学译论”则直接提升了译文的地位。通过回顾当代文化语境下翻译身份的演变, 我们不难发现, 翻译并非润物细无声式的悄然转换, 而是一幅呈现着暴力的画面。“是在充满碰撞与张力的文化关系网络中发生着……不是被动地受到影响或干扰, 而是对相关社会实践所蕴潜的一种积极的实现。”(第20页)

原来, 貌似单纯的“翻译”二字, 背后竟有如此陷阱, 作者顺藤摸瓜, 又对影响甚广的“忠实对等论”进行了深刻批判。从来被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翻译的透明对等, 译作必须不折不扣地忠实原作”这一观念在作者入骨三分地批判中已然坍塌。作者指出, “忠实对等论”建立在一个以天真的“语言再现论”为基础的所谓“人文主义事业”之上。这种观念阻碍了人们去思考贯彻于翻译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 一系列有关“翻译的被压抑、强暴以及从属他者的女性物质就遭到遮蔽。”(第35页) 经由作者对中西古今译论中有关“忠实对等”的盘点, 我们发现, 原来正是中西皆然的对等观念导致了对原文的无限崇拜, 并长期将翻译研究囿于单纯的译文对比分析, 满足于“经验式、感悟式、印象式”的阐发, 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与科学的翻译研究相去甚远, 甚至可以说南辕北辙。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 翻译研究又被注入新鲜血液,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暴力、翻

译中的性别政治等成为翻译研究的新视野。至此,我们在作者的带领下,剥茧抽丝,层层梳理,终于进入翻译研究中被隐藏遮蔽的世界——翻译的政治。

我们仍将在故纸堆里作一番穿梭,考察“政治”一词的确切涵义。早在殷墟甲骨、柏拉图著作中已有政治学说,而作者论题“翻译的政治”所涉及的“政治”内涵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即关注“政治权力”层面,(第59页)并由此将“翻译的政治”定义为“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或隐或现的权力关系。”(第64页)作者分别将东汉佛经翻译和公元前3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的翻译作为中西“翻译的政治”命题的起源,并沿历史之流而下进行一番考察,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后期杰罗姆的《圣经》翻译开始,“权力关系”一直伴随翻译实践始终,只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这一命题才被上升到学理层面。福柯以“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消解了传统“忠实对等论”的话语透明化,勒菲费尔充满浓郁权力色彩的“改写”策略、斯皮瓦克语言的“三面结构”、谢莉·西蒙的“女权主义译论”,以及中国自严复以来关于“翻译的政治”的一系列探讨,都成为作者此番匆匆巡礼的站点,而我们对理论层面上“翻译的政治”也有了较为明晰的概念。

为了便于更加明确“翻译的政治”之命题,作者接下来精心构建了两个微观领域:前者以“翻译中的性别政治”命名,后者则冠以“翻译的暴力政治与后殖民批评”。无论是“性别研究”还是“后殖民批评”,都是当前理论界炙手可热的焦点,而作者此次梳理却力避套用理论、泛泛而谈,而是从小处着眼,先从悠远的西方文化传统中清理出性别问题,仰仗这笔丰厚的“性别研究”资源,“翻译中的性别”自然映入眼帘。不过这一时髦的命题由来已久,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就已经为翻译中的性别问题作了种种喻说,而真正突破感悟、经验而将其提升至理论层面,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学者吹来的强劲之风。在他们的积极推进下,性别研究与语言问题彼此纠缠,“译

者和评论者的性别所属(gender affiliation)随之成为一个问题”,(第115页)在此背景下,我们随同作者游历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女性译家所构筑的世界。由于被剥夺了“著书立说”的权力,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沉默的边缘,而翻译作为“被逐出著述之外的妇女的一种‘被允许的公开表述形式’”,(第118页)立即成为许多女性译家充分施展才华的场所。她们对作品进行了充满权利意识的改写,如阿拉芙·本就在译作中以嵌入“我”和在页边处作出“女性译者以自己的名义言说”的方式彰显自己作为女性译者的身份。这种通过截断“翻译的不绝流量”以提醒读者关注译者自我的行为,正是女性译者对传统翻译观的颠覆,同时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处于静默的女性群体赢得话语权,“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妇女说话……要使女性在语言中清晰可见。”(第185页)

将“翻译的暴力政治”上升至学理层面进行探讨,始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结合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以后,人们对于翻译的理解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透过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审视我国的西文翻译以及基督教教义在世界各地的翻译、传播,就会获得另一番视野:大量翻译外文作品会使得“后殖民者”再次殖民化,宗教教义的翻译更使翻译行为本身蒙上了政治面纱。作者选取“权力”与“反抗”作为深入探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两极,通过述评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妮南贾娜等人的译论,对翻译中隐含的欧洲与殖民地国家之间以及整个欧洲“内部殖民”之间的暴力政治进行了系统批判。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如德里达的“差延/延搁”之说,福柯和罗兰·巴特对“作者”一词的质疑,特别是本雅明的“来世论”、“碎片论”、“切线论”等观点彻底将翻译的重心由“再现”原文带至“解构”原文,翻译由此担当了在殖民霸权下对共同的主体性诉求的建构,并成为后殖民书写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后殖民小说《宽阔的莎加索海》和《崩溃》的解读,我们发现它们作为《简·爱》和《黑暗的心脏》的翻译和改写本,是被殖民者在解构原文的过程中对自身文化与身份的一种积极建构。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林

纾与曾宗巩对笛福作品的翻译上。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对英国人的独创性有意拔高和彰显,而林纾却在翻译选词方面故意将中国文化嵌入其中,这种译事策略与女性译家在译作中突出自我一样,既是翻译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更体现了不均等权力下“翻译的政治”。我们通过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提供的阅读视角,获得对这样一种“政治”的解构,从而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貌似公允的从原文到译文的翻译过程中,隐藏着多少陷阱,遮蔽了多少极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这一思考对于翻译研究理论的科学化也大有益处,有助于摆脱传统翻译研究思维模式的制约,从学理上、文化上以及更深更广的层面来看待翻译这样一种书写行为。

于是,作者热切呼唤“翻译诗学”的诞生。翻译研究不关涉文化内容是不完整的,而文化研究置翻译研究于不顾也是残缺的,“翻译诗学”的提出在于将二者更好地沟通起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一番苦心。文化研究发展三部曲:“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后结构主义阶段”直接影响了近20年来的翻译研究,二者之间密切相连,致使“翻译诗学”命题上升到学理探讨层面。其实,将翻译研究置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背景下并非作者首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与翻译两个研究领域的彼此转向,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已率先开展了文化层面上的翻译文学研究。“译介学……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作为文学翻译)作为人类的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①其实就是关注翻译行为背后体现的种种社会文化关系。而作者在此明确提出“翻译诗学”的概念,将译介学对“翻译文学”的关注扩大至与思想、历史、传媒等诸多领域相关联的整个翻译研究之中,有助于今后更好地拓宽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通读整部书,我们感觉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交错的漫长旅行,一方面是从阅读中所获得的开启心智的愉悦,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叹佩作者

占有资料的翔实与丰富。从上古时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纵横于几千年历史当中,作者从浩如烟海的中外译论里细心爬梳、鉴别、比较,为我们精心绘制了这幅“翻译的政治”的谱系图,面对绝大多数为外文著作、论文的原始资料,需要作者付出极大的勇气和耐心。为了对这一宏观概念有一个细致入微的把握,作者从“女性主义”及“后殖民主义”视角探求“翻译的政治”的真实面目,面对这两个颇为时髦的理论,作者除却浮躁之气,征引事例,对论文关键部分的术语不厌其烦地追根溯源,娓娓道来。对于一些源出西文不易理解的概念、书名,均以英、法、德等原文辅以中文翻译,便于读者自行体悟,这一切足见作者的耐心、细致和严谨。为了阐明“翻译的政治”这一概念,作者从“翻译”到“政治”,逐个剖析,推源溯流,用一章的篇幅对“翻译的政治”的历史由来、发展走向作出准确清晰的描绘。在接下来的个案研究中,无论是对性别问题的探讨,还是考察“暴力政治”的生成,作者无一不是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大量参考中外译家的见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其说这表现了作者注重论文行文、组织、表达,毋宁说是一种学风的体现。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作者不厌其烦地旁征博引,我们可以理解作者是希望在论述上尽可能做到全面周到,但征引过繁,转述过多,无形中受庞杂材料的掣肘,而没有机会来透彻阐述自己的观点;另外,也导致了某些内容与议题之间关系上的松弛,论述结构上的某些地方因此显得松散。

我们在书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始终站在学科前沿,能够把握最新理论动向,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经过当代理论洗礼之后,“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把‘翻译’首先理解为‘翻译的政治’,把‘翻译’开放为一个权力批判和文化冲突的‘政治’场所”。^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提出“翻译的政治”的命题就显得很有必要,也

十分迫切,而“翻译的诗学”的提出,也颇显作者的勇气。但是,“翻译的政治”作为一个大概念,应该包括赞助人、译者的专业能力、地缘政治、改写、挪用、主流诗学、文化政治等十余个层面,作者在书中仅仅重点关注了性别、暴力、解构等几个方面,相对于“翻译的政治”这一大课题,本书的探讨还存在一些未及开掘的空间。但作者显然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第一章结束时便明确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本章属于一个‘未完成的叙述’(incomplete narrative)。对于整个庞大项目的完成,只能有待于来日。”(第94页)相信作者将会对这一课题继续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关注,并不断充实完善“翻译诗学”命题。

本书的另一特点便是作者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与危机意识。作者在书中不同章节多次提到刘禾的观点“人们时常记忆着却是为了遗忘”,足见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焦虑。的确,当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高扬反对父权制、反对霸权的大旗时,实际上却反讽地陷入了父权制话语的怪圈,重复了它所摒弃的霸权色彩。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呼唤“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理论批评界给予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译论足够的关注,同时又忠告人们提防此间的陷阱,避免陷入“阿喀留斯脚踵”的怪圈。正是在作者的提醒及引领下,我们在阅读过程中紧随作者思考“翻译的政治”历史的、现实的意义。从历史发展来讲,它是妇女及被压迫者言说自身的一种方式,是反抗父权制社会、颠覆传统、消解中心的工具,因此意义重大。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有两千年的翻译实践史,但翻译理论的发展却长期以来一直逡巡不前,绝大部分翻译研究者仅仅立足于语言层面就事论事的肤浅研究,并以此为满足。“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的介入,无疑对中国传统译学研究敲响一记警钟。哲学、史学、文论等与翻译相结合,必然会打开翻译研究的新局面。作者在此基础上,急切呼吁“语言层面的外语人……尽早从那种经验式的、印象式的、感想式的怪圈走出,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外语学人的肤浅思维范式及落后的研究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第21页)

但于此同时,作者关于中国译论的探讨在内容上却又似乎有些薄弱。不可否认,“翻译的政治”、“殖民”、“解构”等概念及理论诞生的土壤在西方,相关的西学资源也颇为丰富,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但既是考察中西翻译的政治,少了对本土资源的深入发掘和思考,未免让人感觉有点遗憾。其实中国在此论题上并非绝对“先天不足”,而是有着许多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如果将“翻译的政治”定义为“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或隐或现的权力关系”,除作者书中提到的内容外,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外族入侵,其间蕴含着多少权力关系与文化碰撞,又有多少“翻译的政治”值得书写!如果不潜入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內部进行搜寻,积极发掘特定社会背景下的权力关系,在目前西方理论掌握话语霸权之时,我们很可能重蹈作者在文中着意反对的“伪普遍性”之覆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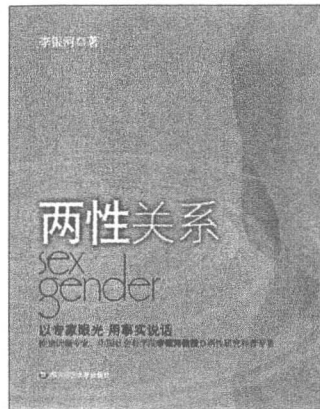
通过对中西“翻译的政治”资源一番呕心沥血的检阅,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部资料翔实的著作。作为国内首部以“翻译的政治”命名的学术著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我们更愿意看到作者以此为契机,在这一大有可为的领域中不断深入思考下去,带给国内译学界更多新知和专精之作,同时,也更希望中国翻译研究界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开掘翻译研究新领域。

注:

-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 ② 罗岗:《翻译的“主题”与思想的“主体”——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视角》,《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
赵云中著 2005年6月出版



《两性关系》李银河著 2005年8月出版



《爱与思——生命的注释I》
克里希那穆提著 范佳毅译
2005年8月出版



《单纯的品质——生命的注释III.2》
克里希那穆提著 徐文晓译
2005年8月出版



《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
刘小枫著 2005年8月出版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原本充满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翻译理念总是驻足于一般的语言转换层面之间,其研究更多地关注“忠实-对等”问题,最后在对原文与译文进行简单对比的基础之上得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这样的翻译理念,建立一个经验-唯心主义的框架内——一个以天真的语言再现论为基石的所谓“人文主义事业”之上。它阻碍了人们去思考贯穿于“翻译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一系列有关翻译被压抑、强暴以及从属他者的女性气质遭到遮蔽”。

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进入“喧嚣与骚动”的解构主义语境后,一大批文化批评家,如荷兰的霍尔姆斯(J.Holmes)、以色列的吉登·图里(Gideon Toury)、英国的巴斯奈特(S.Bassnett)等“操控派”学者异军突出,对这样的本质主义翻译理念予以挑战,激情满怀地推崇一种“译文中心的”(target-oriented)翻译理念,聚焦译入语文化对原作施加的政治-权力层面。此时的翻译理念已作别过去的语言层面而阔步迈入文化之维。到了80年代,翻译研究正式进入“后结构(解构)”阶段(巴斯奈特语)。这一翻译研究的解构势头,当九十年代向我们走近的时候,几乎到了“变本加厉”之地步。一大批名声太震的当代

权力化的翻译,“解构时代”如何不想它?

——感受《翻译的政治》

沪言

西方批评家义无反顾地加盟这一“解构之师”。加拿大女性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推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系统讨论翻译的性别政治、暴力政治、赞助人政治等权力层面的理论文本,如《翻译中的性别》(西蒙)、《翻译的政治》(斯皮瓦克)、《文化的定位》(巴巴)等。这些批评家通过这些文本所津津乐道的焦点问题不但成功地刷新了翻译研究本身的思维范式,也当然地化作时尚的文化研究学科的话语资源,因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学科的内涵就指向性别、暴力、赞助人制度等义项(陆扬等人语)。所以,从此时起,翻译研究就与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过,这种“热闹”的研究却令我们感到陌生,尽管2000年以后国内学者已开始介绍相关篇什,但目前缺乏对这些著作的系统而深刻的研究。

幸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5年3月推出的专著《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费小平著)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内心深处的陌生,促使我们信心百倍地走进“翻译的政治”,感受这套振聋发聩的译学话语。

《翻译的政治》,由同名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书目录(2005年1月—6月)》称,“系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翻译政治问题的专著,采用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视角,通过研读大量的第一手英文文献并兼涉部分中文文献,清理贯穿于翻译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权力层面,对中西语境中的翻译政治进行溯源追踪和学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翻译诗学’之构想”。

全书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翻译的政治问题检讨”,认为翻译的政治指涉翻译在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

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包括译者的能力、性别身份、操纵策略,客观因素包括外在施加的暴力、媒体、助人制度等。不过,不同语境下滋生的翻译政治命题,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内涵、外延肯定会有所差异。第二章是“翻译中的性别政治”,属于个案研究,它认为翻译的性别政治问题可追溯至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的西方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二对立。该章挖掘了一批长期被压抑、被遗忘的处于“边缘化”的西方和中国女性译家,时间跨度从文艺复兴、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这些材料在国内女性主义批评界、翻译研究界和比较文学界均为首次梳理。它们能丰富女性主义批评的语范式,对于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语言)的二元对立和女性观念,创造一种女性经验透视,改变翻译史上女保持沉默和立于边缘的传统,谱新的译界女性神话有着

重要意义。第三章是“翻译的暴力政治与后殖民批评”,同属个案研究,以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来讨论翻译的暴力问题。它说,翻译的暴力行为折射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扭曲与压抑,构塑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是殖民化的开端。翻译就理所当然地与文化霸权密不可分,而文化霸权又与经济霸权密不可分。第四章是“重建翻译诗学”,作为结语,力争在对翻译的政治进行宏观与微观讨论的基础上并借鉴前辈学者的成果,重建文化层面上的“翻译诗学”。全书从政治学、社会学、性别批评、后殖民批评等宏观处俯瞰,伴之以微观的实证调查与数据分析。构成框架是问题清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论证周密,材料扎实,叙述明了,富于激情。

《翻译的政治》能使翻译研究走出就事论事的“忠实-对等”泥沼而步入译文中心层面,建构新的文化立场;能使译界认识到翻译文本充满着断裂、杂糅等异质性文化成分,是各种语言习俗、符码、意识形态的竞技场;能拓展文化研究的疆域;能为我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媒介通道;能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及形象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学科对象。总之,《翻译的政治》一书令“解构时代”的学界欢呼雀跃,尽管它有诸多不足等待着学界的批评。

《乌本书记述远古时期,世纪20年间跨度仅一百余年第一本乌克兰学界而言写乌克兰历史的文献。正提供历史、不同行批判性)向中国读:兰人民走i

《两性家庭、河博士的最社会生活里,人类发生了革命性和人类关系析了世界及以及引起最公民权与政教育、健康与!家庭、暴力、俗与观念等关系中处于作者的学术

以第5页

“十五”期间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回顾

(见“教育部人文社科管理中心网站”2006-10-23 公布)

“十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取得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蓬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精神鼓舞下，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若干意见》指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地方高校乘势而起，抢抓机遇，积极响应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注重实效，推出了许多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从而使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工作¹在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增强承担科研项目能力、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促进学科发展和科研体制改革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在参加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方面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我国长治久安的生命工程、奠基工程。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周济部长担任组长的实施工作小组，动员和组织全国高校的研究力量，积极参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各项任务。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地方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中，参加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当中，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等，围绕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性和前瞻性²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创新体系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东方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

方高校积极参与教育部《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体系及机制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精彩一门课”全程教学示范片研究制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研究》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大课题，整合力量展开联合攻关，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出一流成果奠定了基础。

地方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围绕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深入钻研，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福建师范大学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科学劳动理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发展问题。苏州大学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通过探索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黑龙江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内蕴”在我国学术界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既是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新发现和探究，又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回应和总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河南大学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较为全面地论述和探讨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社会批判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的思想，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体系建构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江西师范大学的《邓小平德育思想研究》从原著出发，提出并坚持“大德育”的理念，系统深入地研究和阐述了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战略重点、战略要求、主要内容、方法途径等，比较完整地阐发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南昌大学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从唯物史观视角解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论证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对于帮助人们加深对这一重要理论的理解，增进人们对这一党的指导思想的认同与信仰，增强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科研能力方面

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哲学社会科学，关键在人，在于研究队伍的建设。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期待着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的形成，呼唤着一批高素质理论人才的涌现。“十五”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方高校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紧紧抓住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结合各自区域的实际情况，切实加强高水平研究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工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地方高校有计划地通过集中培训、重点指导和互相交流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研究骨干，着力打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初步形成了导向正确、功底扎实、结构合理、勇于奉献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团队。

从人数增幅和队伍壮大方面看，据统计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总人数已经从2001年的19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7万人，增加了42%；其中教授2.1万人，增加了93%，副教授6.7万人增加了49%；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增加了230%，具有硕士学位的增加了150%，自身增长幅度非常显著。与其他高校相比也是如此，到2005年底，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人员总数占全国高校社科队伍总数34万人的79.4%；其中拥有教授、副教授的分别占全国高校总数的65.6%和77%，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分别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1.2%和73.8%。

从承担相关科研项目的能力上看，以不断发展壮大的人才队伍作基础，地方高校承担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竞争能力也在日益增强。2005年，全国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当年在研项目数已经达到64566项，占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当年在研项目总数97994项的65.9%。其中：中央部委的基金项目4570项，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规划项目27522项，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3.3%和81.9%。天津师范大学、山西大学、辽宁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还通过公平竞争，中标并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研究项目数量的大幅增长，相应带来了研究经费投入的大幅度增长。据统计，2005年全国地方高校科研项目经费总投入已接近6.5亿元，占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总经费的40%，其中：中央政府投入0.87亿元，地方政府投入1.8亿元，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项目的经费2.25亿元。

以上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实力正在稳

步增强，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充满活力的生力军，其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承担项目的竞争能力基本上已经占据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半壁江山。

（三）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

“十五”期间，在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十五”期间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共出版学术著作近 2.6 万部，发表研究论文 74 万篇；从 2005 年的情况看，地方高校共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5683 部，发表哲学社会科学论文 178842 篇，它们分别占全国高校发表作品总数的 23.4% 和 71.45。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据统计，仅在 2005 年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722 项，占全国高校相应获奖总数的 58.5%；在已经公示的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拟获奖名单中，共有 67 所地方高校获得 101 项优秀成果奖，获奖学校数和获奖成果数都比第三届优秀成果奖增加近 1/3。这些优秀成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围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并根据地方高校各自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推进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从而为坚持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基础文献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学术力作。安徽大学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安徽师范大学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山东师范大学的《齐鲁文化通史》，河北大学的《宋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两宋货币史》，河北师范大学的《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河北经济史》，河南大学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古代北方经济史》，郑州大学的《周礼译注》，苏州大学的《清朝文官制度》，上海大学的《民国诗话丛编》，天津师范大学的《服饰与中国文化》，云南大学的《儒道佛美学思想源流》，扬州大学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南昌大学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通史》、《蒙古游牧文化溯源》，四川省的《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宁夏大学的《西夏经济史》，西藏大学的《西藏地方传统文化史研究》，新疆的《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等都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宁夏大学编辑的大型系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是继《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后，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中的又一重大成就，在整个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该书的出版，将中国藏西夏文献推向世界，被誉为西夏研究中的里程碑工程。福建师范大学斥资百万元精心编辑出版的百卷《台湾文献汇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为揭示台湾历史发展变迁，揭示两岸不可分割的文化渊源关系，提供了最原始、最有力的证据，出版之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西北大学的《西部人文丛书》、河南大学的《宋代文化研究丛书》等也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从这些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地方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现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即在研究中密切结合自身的学术传统、学科优势，有的还立足于所处的地域特点，着眼于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特性，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优势学科。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南京师范大学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教育与反贫困》，上海大学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黑龙江省高校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辽宁大学的《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的《儿童个性发展与培养的实验研究》，湖南大学的《伦理学》，安徽财经大学的《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天津商学院的《城市公共物品的市场化配置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的《不确定性决策与金融资产投资》，河北大学的《外国高等教育史》，河北师范大学《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河南大学的《盛唐气象——中国美学思想与艺术审美规律》，河南师范大学的《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研究》，河北经贸大学的《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与培养》，西北大学的《中东国家通史》，西南政法大学的《刑事庭审制度研究》、《沉默权制度研究》，广西高校的《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的渊源与文化》，贵州大学的《翻译的政治》，甘肃高校的《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丛书》，新疆高校的《文化戍边与国家利益》，以及山西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文库》、湘潭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十五”期间，地方高校的广大科研人员还密切关注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各自实际，自觉地把基础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应用于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中，应用于解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以给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经济运行和法制建设的决策提供咨询的方式，拓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渠道。5年来，地方高校共提交咨询报告近3.7万份，其社会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重庆工商大学的规划报告《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科技规划的研究编制》，提出了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科技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发展目标，重点论证了实现目标的主要任务及支撑条件和保障措施，已有多项成果被国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农业部及各级政府决策采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西北师范大学的《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地缘安全问题研究》针对西北地区农牧民的政治价值观及特点，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对西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矛盾、民族地区乡镇政权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社会意识形态、人文资源开发与优化、科教创新与实践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可具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对西北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陕西理工学院的《“十一五”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研究》是国家发改委公开向海内外招标的56个中标课题之一，该课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调整扶贫资金结构，突出支持西部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技推广”的政策建议已被国家发改委所采用。西北大学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作为“西部蓝皮书”陆续发布，它对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已具有重要的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南昌大学的《中国中部发展论丛》就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其重要成果如《中部发展与区域合作》、《中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研究》、《中部崛起与人力资源开发》、《中部地区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部崛起与科技创新》和《中部与东部的互动》等，得到了政府部门、经济研究部门和广大学者的高度关注，所提出的有关促进中部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报告得到了中央政研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财经委等决策部门的认同、部分采纳和吸收。辽宁大学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研究》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其研究获得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如《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为辽宁省获得国家开发银行 500 亿元软贷款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受到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行长、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的高度评价；《提高政府组织动员金融资源能力研究》为辽宁省获得中国建设银行 1000 亿元贷款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好评。云南大学的《中国石油安全》综合应用能源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分析了 21 世纪初期（2002-2020 年）的国际石油供求和油价走势以及我国石油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战略对策建议，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决策参考，外交部李肇星部长对该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其他如贵州大学的《贵州省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西藏大学的《西藏跨越式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青藏铁路那曲段经济带建设研究》，重庆的《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浙江工商学院的《县域金融重构：基于县域经济内生需求的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上海海事大学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口岸物流业发展研究》，湘潭大学的《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江西财经大学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研究》等，都在各自的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各地方党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四）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哲学社会科学是开放的，是与世界文化融合的，也是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十五”时期，地方高校进一步确立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办学理念，高度重视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勇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汲取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对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

一是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够多领域地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加各类国际交流活动达到 59528 人次，各类来华学术交流人员 38129 人（次）；地方高校开展国际合作项目达 965 项；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约 6200 篇。

二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方式更加多样化。“十五”期间地方高校更加自觉地确立国际视野，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展开国际交往、

合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165 场（次），不仅积极地请进来，而且也主动地走出去，共同举办国际会议，联合培养研究生；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三是注意提升国际交流的层次和水平。“十五”期间，许多地方高校都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质内涵和影响，不断提升交流与合作的层次和水平，许多国际一流学术大师相继接受邀请来国内讲学、访问，一些高层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接连举行。这些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成为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获得国际化视野的重要桥梁和途径。

（五）在科研体制改革和研究平台建设方面

科学研究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而科研管理体制及运行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学校的办学精神和效率。“十五”期间，各地方高校能够结合自身的办学传统和优势特色，积极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改革，在构筑社科研究平台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

科研机构是开展研究工作重要的支撑平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是深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十五”期间，各地方院校打破院系和学科的界限，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整合优势研究力量，凝练特色研究方向，创办机构和建立了一批有学术优势的重点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国家和省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教育部在地方高校设立了 16 所重点研究基地和 16 所省部共建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基地所采取的择优遴选、定期评估、不合格淘汰、达标替补”的动态管理，以及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基础上所推行的“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部竞争创新”的运行机制，既为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注入了研究活力，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运行以来，有效地整合了所在学校的科研资源；作为地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区，基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信息资料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示范和引导下，全国已有 14

个省、市和自治区先后建立了 249 所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科研机构的建设表明，各省、市、自治区和地方高校立足于创建高水平研究基地，其目的在于结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努力推进以国家基地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科研机构建设，强化三级科研创新平台的连通机制，为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创新平台。山西大学确立了“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带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整体发展”的思路，一方面强化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自身建设，另一方面发挥重点研究基地的辐射作用，有力推动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和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内蒙古大学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蒙古学研究中心”及相关的 9 个研究机构为主体，形成其社科研究的特色及地方优势。河南大学通过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建设推动了科研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已基本形成了国家-省-校三级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研究平台体系，为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可以看出，一个由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构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金字塔”正在形成。